

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战争

沙健孙 主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战争

(上)

沙健孙 主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代前言

沙健孙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第一次赢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

中国的全国性抗战，是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中国守军奋起抵抗日军进攻开始的，到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历时整整八年。实际上，在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之后，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之前，中国局部地区的抗日战争，主要是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已经进行了六年多的时间。所以，总起来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前后持续了十四年之久。

自1840年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以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国家，不论大小，几乎都曾经欺负过中国；而近代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也无不是以中国失败、被迫接受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告结束。“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的腐败，二是经济技术的落后”^①。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和经济技术落后的状况虽然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但是，中国已经具有了新的以往所不具备的进步的因素。主要是，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了已经或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有了共产党（它已经积累了两次革命的胜利和失败的经验，在政治上达到了成熟），有了政治上进步的军队即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有了局部的人民政权即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政权。总之，腐败的社会制度已经局部地被废除。中国已经“处于历史上进步的时代，这就是足以战胜日本的主要根据”^②。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4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7～448页。

由于处在这个历史上进步的时代，中国共产党成了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抗日战争才得以坚持并取得最后胜利。这是抗日战争成为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史上的崭新篇章的决定性条件。

一、率先举起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旗帜

1931年9月，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阶段。

日本是当时东方的头号强国，也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帝国主义强国之一。它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是蓄谋已久，并且经过了长期的准备的。灭亡中国，是它的既定的方针和国策。要不要武装反抗日本的侵略，这是中国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

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了武装抗日的旗帜，号召中国人民动员和组织起来，投入保卫祖国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即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宣言》中，愤怒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显明的目的显然是要掠夺中国，压迫中国工农革命，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之后，中共中央更在一系列的文告中，号召“工农武装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同日本帝国主义举行民族的革命战争，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尽管当时的中央受到“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一度提出过“武装保卫苏联”、“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错误口号，但是中国共产党主张武装抗日，则是坚定明确、始终一贯的。这与当时国民党政权采取的“不抵抗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中国共产党不仅参加并积极推动了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而且直接领导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派大批党员、干部到抗日义勇军中工作，同时更突出地提出了建立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武装的任务。1933年初，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先后在南满、东满、北满、吉东等地崛起。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后改组建制为东北抗日联军。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他们在白山黑水之间，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殊死的搏斗。

值得注意的是，还在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共产党即开始

了同部分国民党人进行武装抗日的合作。首先，是九一八事变后同留存在东北的以原部分东北军为主体的抗日义勇军的合作。其著名领导人李杜成了共产党的亲密战友，后来还加入了共产党。1933年，又与原西北军领导人冯玉祥合作，建立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其爱国将领吉鸿昌翌年加入共产党（后被国民党杀害）。同年，还与奉命开往福建“剿共”的十九路军合作抗日反蒋。十九路军失败后，其领导人李济深、蔡廷锴等继续与中共保持联系。党曾派宣侠父去香港，帮助他们建立中华民族革命联盟，呼吁成立“联合阵线，武装抗日”。

当时，国民党统治着全国绝大部分地区，没有国民党的参加，全国性抗战的局面是难以形成的。针对1935年华北事变以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蒋介石集团对日态度有可能发生变化的新情况，中共中央提出，“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1936年5月，毛泽东、朱德发出要求南京政府“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9月，中共中央放弃“反蒋”的口号，提出“逼蒋抗日”的方针。12月12日，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为推动抗日对蒋介石实行“兵谏”。中共中央从民族大义出发，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进行全国性的抗日战争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中国共产党关于武装抗日的政治主张和促进全国团结抗日的实际行动，对于推动以蒋介石集团为主体的国民党政权走上抗日的道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而去”^①。

1937年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国守军奋起抵抗日军的进攻。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发出通电，强调“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7月9日，人民抗日红军将领率全体指挥员战斗员致电国民政府，要求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驱。7月14日，中共中央军委下达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听候出动的命令。7月15日，中共代表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国民党。9月22日，该宣言由国民党中央通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7页。

讯社公开发表；次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这标志着以抗日为共同目标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下，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得以宣告成立。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事件。在这个基础上，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终于发动了。毛泽东在当时就指出：“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①

二、制定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的路线即人民战争的路线

抗日战争发动以后，中国面临的最中心的任务，就是如何坚持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

当时的日本虽然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强国，但同时又是一个小国；中国虽然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弱国，但同时又是一个大国。作为小国的日本之所以敢于对作为大国的中国进行武装侵略，不仅是依仗其自身军力、经济力的强大，而且是利用了“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这个弱点。这是日本敢于欺负我们的“主要的原因”。^②正因为如此，把处于无组织状态的中国民众动员和组织起来，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这就是“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③。对于这个关键问题，中国共产党是在抗战刚刚开始时就加以指明了的。中国共产党人确信，“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要把中国民众组织起来了，我们就有了克敌制胜的基本条件，“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几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象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在这种情况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④。

应当说，面对日本的侵略，中国所有前线的军队都进行了英勇的抗战，表示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到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25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2页。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这一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样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勃勃的新气象。”^①但是，由于国民党统治集团害怕人民的广泛动员有可能危及地主买办阶级的政权，它所实行的是一条只要政府和军队抗战、不要人民抗战的片面抗战的路线。实行这种路线，抗战是不可能长期坚持并取得最后胜利的。在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由于日本侵略者暂时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对国民党开始采取以军事打击为辅、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它便开始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路线。而这条路线，更是只能把抗战引向失败。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指出：“两条路线：国民党政府压迫人民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和中国人民觉醒起来团结起来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这就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②。

中国共产党是人民战争路线的积极倡导者，更是它的坚决执行者。1937年8月，党的洛川会议即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主张实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党的七大所概括的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实际上也就是党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

在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他们是人民群众的主体部分。进行人民战争，首先和主要的，就是要发动和组织广大的农民。中国共产党派遣自己的党员、干部和人民军队的指战员深入敌后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和群众工作，创建抗日民主政权，逐步地把落后的农村建设成了先进的革命阵地。为了减少地主对于抗日的阻力，党暂时停止执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为了调动农民的抗日积极性，党坚决赞助农民解决民主民生问题，认真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正是在党的领导下，广大农民积极参加农会、妇女救国会、民兵及其他地方武装组织。他们踊跃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到处呈现出“母亲送儿子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情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4页。

景。在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条件下，党继续带领人民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日本侵略者占领的土地日益缩小，他们所能控制的只是少数城市和交通线。他们确实陷入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战争的包围之中。

为了实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中国共产党主张抗日的政治动员应当成为经常的运动；主张开放爱国运动，武装民众实行自卫，并配合军队作战；主张改革政治机构，实行民主政治；主张改善民生，实行改良人民生活的政策。党坚决赞助人民群众解决民主民生问题，以便推动各阶层人民积极地投身于抗日斗争，形成“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的伟大局面。由于抗日战争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事业，党主张“动员蒙民、回民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党还在知识界、工商界以及海内外华侨、侨眷中积极开展工作。中国共产党坚信，只要“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①

为了实行全国军队的总动员，中国共产党主张按照坚决抗战的总方针，立即出动军队开到国防线上；实行正规战争与游击战争的配合；改造军队的政治工作，使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党直接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革命武装，是人民的子弟兵，是抗日的模范队伍。这个队伍，坚持了党的绝对领导，完善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开展了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努力把进步的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有效地密切了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军政关系；除担负作战任务外，还从事群众工作和参加生产运动；实行主力兵团、地方兵团和民兵三结合的革命武装斗争体制；等等。正因为如此，这个队伍得到了人民尤其是农民的真心拥护和全力支持。毛泽东说过，“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这支与人民打成一片的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从抗战开始时的不足五万人，迅速发展到中期的十几万、几十万人，后期的一百二十万人，成了坚持抗战、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坚力量，“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②。

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倡导和实行的人民战争路线，确实是战胜民族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5页、第48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9页。

敌人所必须遵循的惟一正确的路线。

三、提出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应当采取何种战略方针呢？这是一个必须面对并加以回答的重大问题。

还在全国性抗战爆发的前夜，1935年12月，毛泽东就指出，“要打倒敌人必须作持久战。”1938年5月，他总结抗战八个月的经验，作了《论持久战》的讲演。他指出，中日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日本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而其短处则是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之寡助。”“中国的短处是战争力量之弱，而其长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进步性、正义性，在其是一个大国家，在其国际形势之多助。”在这里，强国弱国的对比，决定了这场战争只能是持久战；而大国小国、进步退步、多助寡助的对比，决定了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只能是属于中国的。据此，他强调，中国必须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以便在长期斗争中逐步削弱敌人、壮大自己，争取最后的胜利。他预言，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将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他并且对这三个阶段中中国军队作战的主要形式、正规战（阵地战、运动战）与游击战的战略地位与作用的转换等作出了科学的判断。

中国的抗战是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进行的。国民党的政府军担负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主要进行的是正规战。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担负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主要进行的是游击战。两个战场实行的是战略上的配合，即从全局来看，是共同进行反对日本侵略的作战；但并不是在每一场具体的战役战斗中实行直接的配合。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是独立自主地进行的。

游击战，一般地说，它历来是弱小的军队抵抗强大的军队、弱国对抗强国的有效的作战形式。不过，在通常的情况下，游击战往往只是一种辅助性的作战形式，在战役、战斗中对于正规战起着配合的作用。在抗日战争的初期和中期，游击战曾经被提到了战略的地位，即具有了全局性的意

义，它成为人民军队作战的主要形式，在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中显示过神威。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作战形式，是基本的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人民军队首战平型关，进行的是运动战（正规战的一种）。此役歼灭日军千余人，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人民军队在1940年8月至12月进行的百团大战也是运动战。此役共毙、伤日、伪军两万五千余人，攻克敌据点三千个，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2公里，并有大量缴获。但是，在大部分时间里，人民军队主要进行的是游击战争。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要求人民军队这样做，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的敌人是强大的日本侵略者，友军则是昨天的敌人、当时仍对人民军队怀有敌意的国民党政府军，在这种情况下，集中兵力打运动战对于保存人民革命力量是不利的。稍有不慎，就有被敌人全歼的危险。如果这样，抗战的坚持和胜利都将成为严重的问题。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把人民军队分散开来打游击，可以充分地把敌后广大的人民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并且依靠群众创造各种办法，最有效地打击日本侵略者。抗战刚开始时，人民军队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在内，总数不过五万人，以这点数量不大的兵力去打正规战争，其作用是很有限的；但是用它去打游击，这五万人就成了五万个火种，散播到敌后广大的土地上，可以组织起千百万群众、点燃起燎原的烈火来，其作用的巨大就是难以估量的了。

事实上，在反侵略战争的各个阶段上，敌后游击战争都具有重大的战略作用。

在战略防御阶段，从战争的全局看，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正规战是主要的，敌后的游击战是辅助的。但是，游击战在敌后的广泛开展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却使得敌人不能保持对占领区的牢固控制。这样，就迫使敌人不得不把用于进攻的兵力抽调回来保守其占领区。所以，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对于停止敌人的进攻、使战争转入相持阶段，是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的。

在战略相持阶段，游击战上升到主要的地位。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以后，它开始停止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逐步将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人民军队，以保持和巩固其占领地。在1939年和1940年两年间，华北地区的日军出动千人以上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大“扫荡”就有109次，使用的总兵力达50万以上。由此，中国共产党担负起了抗

击日本侵略军的主要责任，人民军队所进行的游击战也就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作战形式。这个阶段是抗战时期最艰难的也是最重要的。削弱敌人、壮大自己，逐步改变敌强我弱的态势、为实行战略反攻准备条件，这个任务，主要是在这个时期由人民军队进行的游击战来完成的。到 1940 年底，人民抗日武装部队已经发展到 50 万人，还建立了大量的地方武装和民兵；在华北、华中、华南创建了十六块根据地（晋察冀、晋冀豫、晋绥、冀鲁豫、豫鄂边、山东、皖东北、皖东、皖南、皖中、苏南、苏中、苏北、豫皖苏、东江、琼崖），加上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已经拥有一亿人口。1944 年春季，敌后战场人民军队转入攻势作战。他们已经抗击着全部侵华日军的 64%。在全民族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成了抗日的主战场，对于坚持抗战、削弱敌人、准备反攻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关键性的作用。

游击战还为人民军队进行战略反攻准备了条件。在战略反攻阶段，游击战不再是主要的作战形式，因为只有进行正规战争才能达到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的目的，仅仅靠游击战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但是，这个阶段人民军队进行的正规战争是由游击战上升起来的，后者在相持阶段就担负了在反攻阶段向正规战主要是运动战发展的战略任务。正因为如此，在 1945 年 8 月反攻阶段到来时，人民军队已经发展到了 120 万人、民兵 220 万人，抗日根据地达到了 19 块。敌后军民的大反攻，就是在此基础上胜利展开的。

在八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对敌作战 12 万 5 千余次，消灭日、伪军 171.4 万余人，其中日军 52.7 万余人。他们为坚持抗战、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伟大的彪炳史册的贡献。

四、组织和推动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民主运动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存在着三种地区，即：日本占领区（敌占区，或称沦陷区）、国民党统治区（一般也称作“大后方”）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除陕甘宁边区外，主要是敌后的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基本上是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在日本占领区即敌人后方逐步开辟出来的。解放区的

扩大，就是日本占领区的缩小。因此，领导敌后军民，通过开展游击战争，直接打击日本侵略者，创建、巩固和扩大解放区即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是党在抗日时期工作的主要方面。与此同时，党还努力开展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的工作。在国民党统治区，党的任务不是直接进行武装斗争，而主要是开展群众工作，组织和推动抗日民主运动。这也是为动员全国人民实现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的路线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在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具体领导，先是主要通过中共中央长江局（1937年12月成立）、以后主要通过中共中央南方局（1939年1月成立。周恩来为书记）来实现的。其主要任务是，动员和组织群众的抗日救亡斗争；坚持国共合作，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团结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各阶层人民，开展民主运动，推动大后方各方面的进步和抗日文化工作的发展；发展、巩固党的组织，积蓄革命力量；等等。考虑到斗争环境的复杂性，中共中央规定，党“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政策，是一方面尽量地发展统一战线的工作，一方面采取隐蔽精干的政策；是在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上采取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① 据此，南方局要求党员做到“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和“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以便熟悉社会、深入社会，做好群众工作和加强在上层社会的活动。

抗战初期，抗日民主运动是以推动国民党坚决抗战和进行民主改革、争取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和活动自由为主要内容的。鉴于国民党以“训政”名义坚持独裁统治引起各界群众的严重不满，经过中共和民主党派参政员的共同努力，国民参政会于1939年9月通过《请政府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案》。会后并掀起了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这个运动提高了大后方人民的民主意识，促进了民主党派的团结。其重要的收获即是第三党等六个党派联合起来于同年11月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该会经过改组，于次年3月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为便于吸收更多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组织，改称中国民主同盟）。民盟的创建，对于大后方的民主运动的发展是一个有力的推动。中共中央南方局对民主党派的联合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随后，在周恩来等的领导下，1941年夏，中国民族大众同盟（一年后改称中国民主革命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3页。

同盟，简称“民革”）宣告成立，其任务是在国民党上层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同时，国民党内的一些民主人士也开始联合，后来成立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其主要活动也是在国民党上层开展工作。

由于国民党当局实行高压政策，1940年9月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大后方的民主运动曾经一度趋向沉寂。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南方局进一步抓紧积蓄革命力量的工作和加强对中间力量的团结和争取工作。其后，国民党当局表示将在战后一年结束“训政”，实行宪政。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南方局和各民主党派的共同努力，1944年上半年，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又在大后方许多城市兴起。在这次民主宪政运动中，针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官僚资本的恶性膨胀等情况，各界人士纷纷要求国民党“一新政策”、“与民更始”，开放民主、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

1944年4至5月，日本侵略军发动打通中越大陆线的战略行动。国民党政府军的若干部队虽也进行过英勇的抵抗，但整个说来，它在为阻击日军而进行的豫湘桂战役中实行了全面的大溃退。大后方人民对此感到极大的愤懑。他们把这种军事上的失败归因于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和腐朽，要求民主的呼声由此变得更为强烈起来。1944年9月，中共代表林伯渠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的主张。10月，周恩来强调，为挽救目前危机，应即“开紧急国事会议，取消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这个主张反映了各界民众的共同要求，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它为大后方正在掀起的民主运动指明了一个中心的斗争目标，有力地推动了这个运动的深入和发展。在运动中，由党领导或影响的进步群众团体民主青年同盟、民主青年协会、新民主主义者联盟、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等纷纷成立。它们作为党的助手，在团结青年学生、工人及妇女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民主运动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1945年1月，南方局更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动员党的骨干、进步人士及知识青年到基层特别是到农村去，“大力进行下层的群众工作”。一些革命的知识分子响应党的号召，继承和发扬“五四”、“一二九”的传统，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对于激发大后方人民的爱国民主意识、坚持国共合作团结抗战、支援抗战前线、积蓄革命力量等，都直接发生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它也为抗战胜利以后形成人民解放斗争的“第

二条战线”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五、坚持、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是在全国各党各界各军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下进行的。中国共产党把坚持、巩固、扩大这个统一战线，视为抗日战争坚持和胜利的一个基本条件，并以之作为自己的重大责任。还在抗战前夜，毛泽东就强调，“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未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①。

“统一战线的中心力量是国共两党，中心问题也是两党问题。”^② 两党都主张抗日，因而有联合的基础；两党又代表不同阶级的利益，实行不同的抗战路线，因而又存在深刻的矛盾。而且，国民党控制着中央政权，在名义上，根据地政府和人民军队是隶属于它的，而它一开始就企图利用这种情况，竭力限制和削弱人民革命力量。正因为如此，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这是一个十分重要同时又是极为复杂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认定，在中日民族矛盾占主要地位的条件下，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联合抗日的原则；同时必须认清阶级斗争仍然存在这一客观事实，在统一战线中自觉地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始终保持自己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目的，“一方面是在保持自己已经取得的阵地”。因为“这是我们的战略出发地，丧失了 this 阵地就一切无从谈起了。但是主要的目的还在另一方面，这就是为了发展阵地，为了实现‘动员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个积极的目的”^③。

正是遵循着独立自主的原则，党在统一战线中采取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

进步势力是指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他们是统一战线的基础，抗日的主要依靠力量。对于党内在抗战初期发生过的那种“对于国民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7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00~60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5页。

党反人民政策让步，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人民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斗争”的错误倾向，中共中央进行了明确的批判和坚决的纠正。为了发展进步势力，中国共产党决定冲破国民党的限制，放开手脚，广泛地去发动人民群众主要是农民群众，发展革命武装和开辟、扩大抗日根据地。这样，就为坚持抗战、争取胜利奠定了基础，也为阻止时局逆转、阻止投降和分裂创造了条件。

中间势力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1940年7月，中共中央在一个文件中进一步把七种人视为中间势力，这就是：国民党中的多数党员，中央军中的多数军官，多数的杂牌军，中等资产阶级，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上层小资产阶级，各抗日小党派。他们都是争取的对象。实际上，被作为中间势力加以争取的，也并不限于这七种人，他们还包括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宗教界上层人士以及爱国侨领等。这表明，党要争取的对象是相当广泛的，只要有可能争取的力量，党都是注意尽力争取的。为了争取中间势力，毛泽东指出，需要三个条件：第一，“我们有充足的力量”；第二，“尊重他们的利益”（如保护私人工商业、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在根据地实行“三三制”政权、使参加政权的人员中中间派占三分之一等）；第三，“我们同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① 党的争取中间势力的主张和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正是在抗日时期，工商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其他中间势力中，越来越多的人与中国共产党发生了比较密切的联系，并且在政治上日益向党靠拢。

顽固势力是指大资产阶级的抗日派。他们采取的是两面政策，即既主张团结抗日，又限共、溶共、反共并摧残进步势力。据此，中国共产党是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即既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来对待它的。具体说来就是：“统一不忘斗争，斗争不忘统一，二者不可偏废，而以统一为主。”^② “要有软有硬，有退让有进攻。但以防卫为主要形式。软到不要丧失立场，硬到不破坏统一。注意软硬的‘分寸’。只有这种斗争可以打破一切‘防共’的阴谋。”^③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7～748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72页。

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针对国民党采取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方针和妥协倾向，为了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在同顽固派作斗争时，党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即自卫的原则、胜利的原则和局部的原则。中共中央指出，“击敌和友是目前军事行动的总方针”。即使是友军中最反动最顽固者，“在彼等没有向我进攻或其进攻已为我击破时，均应采取缓和态度”。对某些部分，只要可能，应与之订立和解协定，就地解决原有争议^①。对于顽固派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则必须做好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准备。按照这样的原则进行必要的斗争，不仅不会破裂统一战线，而且可以使对方有所顾忌、畏惧而不敢过分压迫进步力量，不敢轻易破裂。这是巩固国共合作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尽管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期间，顽固派曾经发动过三次反共高潮，其中每一次都有导致全面内战和国共关系破裂的危险，由于中国共产党根据防御性的原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又注意斗争的局部性和暂时性，其结果就是不仅有效地打退了这几次反共高潮，而且继续地保持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这个事实，生动有力地说明了党的策略方针的正确性。

从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曾经两次同国民党合作。第一次国共合作对于推动大革命高潮的兴起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共产党在当时还处于幼年时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没有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自动放弃对于革命的领导权，以致在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右派发动突然袭击时未能组织有效的抵抗和反击，革命遭到严重的失败，国共关系也宣告破裂。第二次国共合作对于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的发动、坚持和胜利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与第一次国共合作不同，这时的共产党在政治上已经达到了高度的成熟。由于党在统一战线中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并对国民党采取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在极端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把握了革命的正确航向，面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两面政策和很多次的武装袭击，统一战线不仅没有破裂而且还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人民革命力量不仅没有受到严重损失而且还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就不仅保证了党能够成为坚持抗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8页。

战、争取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而且保证了在日本投降以后顽固派破裂国共关系、把内战强加给人民时，党能够顺利地不受损失地转变到以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的轨道上，并且在短时期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抗日战争的历史生动有力地证明：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是坚定的国际主义者，而且首先是最热烈、最忠诚、最彻底的爱国主义者。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人率先举起武装抗日的战斗旗帜，始终站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线。它制定的人民战争路线为坚持抗战和争取胜利指明了方向。它领导的敌后战场发挥了伟大的战略作用，以至成了抗日的主战场。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和坚强支柱。很明显，没有中国共产党做中流砥柱，抗日战争的坚持和胜利是不可想象的。

正因为抗日战争的历史充分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利益的最坚强有力的捍卫者，所以经过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不仅有了空前的壮大，党在人民中的政治威信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把实现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和国家富强的希望，寄托在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周恩来在当时就说过：“1944年，不仅小资产阶级，连民族资产阶级也靠拢了我们。”^①这似乎令人难以理解，但却是历史的事实。当时美国驻华使馆的“中国通”谢伟思、戴维斯写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也曾经公正地指出：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了自私的目的而在牺牲着中国的利益”；而“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受到有积极的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据此，他们断言，“中国之命运不属于蒋（介石）而属于他们”。“共产党人将成为最强有力的和最具有建设性的统一中国的力量”^②。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一个符合实际的科学结论。

① 《砥柱中流》，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463页。

② 美国国务院：《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第五章，1949年。